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2025. 3

VOL.18 NO.3

公共行政 评论

JP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

(A刊)核心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期刊

6月15日出版

2025年第3期 总第105期

●专栏：政策执行研究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公共政策的相机执行策略选择研究

..... 李胜会 李 丹 朱绍棠 1

地方社会政策执行的内在逻辑

——以“多校划片”义务教育改革为例

..... 曾 渝 蒋光明 20

●论文

专项整治治理基层数字形式主义何以有效？

——基于整治主体的分析

..... 张靖宇 甘 甜 过 勇 37

理解城市治理敏捷转型的复杂性及其运作逻辑	
——基于解构制度性行动情境的研究视角	
..... 陈廷佳 赵紫懿 孙 涛	57
基层治理中历史遗留问题何以产生？对政府决策中“当下主义”策略的案例分析	
..... 余成龙 郑晓华	78
激活“公”与“共”：占据结构洞的县域社会组织	
..... 林雪霏 单雅杰	98
信息干预与新业态从业人员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基于外卖骑手随机实验的	
实证研究	申梦晗 苏楚平 申广军 119
城市政府合作关系的不均衡性：基于长三角官员异地考察网络的研究	
..... 林钢健 徐元朔 张蔚文	138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联盟冲突与政策学习	
——基于倡议联盟分析框架	雷晓康 于林霞 157
 ●理论综述	
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元分析方法：进展、范式与方向	
..... 苗 青 朱星魁	175
 ●英文目录与摘要	
	196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公共政策的相机执行策略选择研究

李胜会 李 丹 朱绍棠*

【摘要】 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下，研究执行者兼具作为忠实代理人和地方利益代表者双重角色的相机执行策略选择，有助于打开政策执行的黑箱，剖析执行者的行为逻辑。论文借助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影响下的自由裁量权，并综合考虑政策目标的考核压力，构建了“权力-压力”模型。在“权力-压力”模型中，执行者采取波动式执行、象征性执行、政治性执行、行政性执行四种策略，相应地产生短期有效、效果不佳、效果显著、效果不一这四种执行结果。通过对我国生态保护领域的四个重要政策进行多案例对比分析，研究揭示了执行者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下的相机执行策略选择机制。

【关键词】 确定性 不确定性 相机执行 执行策略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86 (2025) 03-0001-19

一、问题与既有研究

研究执行者在复杂执行情境下的执行策略选择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受政策执行过程中各权变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情境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也相互交织变化。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一种基本特征，事物的发展都处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张力之中（王永昌、李梦云，2021）。人类

* 李胜会，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通讯作者：李丹，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朱绍棠，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编辑部的意见和建议。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急性冲击与慢性压力叠加下产业链韧性提升的机制与政策研究”（21AGL027）。

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的过程，实则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互关系实质性转变的过程（李栋，2017）。当前，得益于经济快速发展、科技突飞猛进、信息传递更加便捷透明、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一些公共政策执行情境的不确定性会不断向确定性发展，继而使政策执行情境的确定性增大。然而，事物的本质具有不确定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006），在人类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不确定性并未因此永远消失（波拉克，2005）。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领域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越来越常见。逆全球化、极端恶劣天气等反映出世界的深层次矛盾凸显，世界发展格局的不确定性增加（王永昌、李梦云，2021）。受世界发展格局的不确定性影响，一些公共政策执行情境的确定性也会不断向不确定性转变，继而使政策执行情境的不确定性增大。在当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转变愈加频繁的复杂情境下，研究执行者的执行策略选择，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打开政策执行黑箱，剖析执行者的执行行为逻辑。

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实则体现了执行者的行为选择。现有关于政策执行策略选择的研究，主要基于组织结构、利益主体、政策属性三个视角。第一，基于组织结构的研究视角，学者主要从科层制组织结构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执行者的执行策略选择，且这种选择通常表现为遵从上级政府的要求。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认为，地方政府作为上级政府的代理人，其行为选择体现了服从上级政府的要求（韦伯，1997）。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强调了上级政府在纵向政府间关系中的主导性甚至压制性作用（倪星、谢水明，2016）。尤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维持着“命令-执行”模式。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与约束，形成了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中央主导型”关系（刘祖云，2007）。在这种组织结构下，中央政府的行政压力、目标考核、问责和激励都约束着地方政府的执行行为，地方政府的执行策略选择体现了服从上级政府的要求。第二，基于利益主体的研究视角，主要关注政策执行者在兼具代理人和地方利益代表者双重角色时的执行策略选择。政策执行者作为地方利益的当然代表，在行使权力时具有谋取私利的行为动机（丁煌等，2004），加上政策任务和政策目标的逐层分解会激发执行者的自利性和能动性，创造出执行者与上级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空间（支广东、李强彬，2024）。因此，从理性主义来解释，政策执行者除了扮演上级政府代理人的基本角色外，也兼具自利者角色（赵静等，2013），表现为在执行政策时根据其扮演的不同角色采取不同的执行策略（徐建牛、施高键，2021）。比如，选择性执行（O'Brien and Li, 1999）、象征性执行（李瑞昌，2012）、波动式执行（陈家建、张琼文，2015）、共识式变通（张翔，2019）等。第三，基于政策属性的研究视角，学者主要讨

论政策执行者如何根据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来采取执行策略。马特兰德认为，政策执行者的执行策略选择取决于政策的模糊性和冲突性，继而产生行政性执行、政治性执行、试验性执行和象征性执行四种策略（Matland，1995）。国内学者也用政策的模糊性和冲突性研究教育政策（周芬芬，2006）、财政政策（汤火箭、刘为民，2012）、环境政策（王法硕、王如一，2021）等领域的执行策略。

上述三种视角的执行策略选择研究，深化了我们对执行策略选择的认识，但已有研究仍然存在有待深入的地方。一方面，随着国际国内形势愈加复杂多变，影响政策执行情境的政策本身、执行者、执行对象、执行环境等因素也更具波动性，从而导致政策执行情境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转变愈加频繁。但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影响执行情境的某个因素来研究执行策略选择，缺少对影响政策执行情境因素的综合考虑。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虽然揭示了政策执行者兼具忠实代理人和地方利益代表者双重角色，但缺少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复杂情境去研究执行者兼具双重角色时的相机执行策略选择。因此，本文基于政策执行者兼具忠实代理人和地方利益代表者双重角色的前提，综合考虑影响政策执行情境的主要因素，研究执行者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下的相机执行策略选择。

二、影响政策执行情境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因素

史密斯在《政策执行过程》一文中提到，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标的团体、环境是影响政策执行的四个主要因素（Smish，1973）。受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影响，这四个主要因素的动态变化以及相互作用会对政策执行情境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产生影响。

（一）政策质量

史密斯提到的理想化的政策是指政策质量，它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因素（Chuaire and Scartascini，2014），反映了国家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能力（Knoepfel et al.，2007）。理想化的政策具有合理性、明晰性、协调性、稳定性、公平性、适应性、连贯性等特征（丁煌，2002；陈水生，2020），能够提高政策执行者和公众对政策的认可度和接受度，降低执行阻力，增加执行情境的确定性。但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权自上而下分配，政策执行由地方政府负责开展（O'Brien and Li，1999），这也导致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之间具有不对等性，政策制定者无法完全预测政策执行情境，理想化的政策难以实现。因此，当政策

质量较差时，容易产生政策执行阻碍，增加执行情境的不确定性。

（二）执行者

史密斯认为，执行机构是影响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之一，但从更具体层面来看，政策执行者作为代表执行机构具体落实执行活动的行动者，其认知水平、政策情绪、利益需求、执行沟通等因素都会影响政策执行效果（宁国良、邓瑞芬，2009；刘伟忠，2006）。执行主体的认知水平和政策情绪会影响政策执行行为的导向。当执行者对政策的认同度高、执行情绪积极时，执行者的执行行为具有稳定性，能够主动运用执行情境的确定性去克服不确定性，增加执行情境的确定性。执行者之间对于利益的需求和执行沟通也会影响执行情境，当利益需求趋同、执行沟通顺畅时，执行者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少，能够减少信息分散，降低执行情境的不确定性。

（三）执行对象

标的团体即政策执行对象是影响政策执行过程的又一重要因素。执行对象的可控性、多元性（赵静、薛澜，2021）、稳定性和对政策的接受度（庄国波，2005）等因素都会影响政策执行情境。当执行对象的可控性和稳定性越大，执行者就越容易与执行对象协商互动，获取的政策协商反馈信息也就越准确和丰富，能够增加执行情境的确定性。执行对象对政策和执行者的理解、认同程度也会影响执行情境的确定性。当执行对象的理解和认同度高时，他们会积极支持和主动配合政策执行（王学杰，2008），能够增加执行情境的确定性。

（四）执行环境

经济压力、行政文化、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等都是影响政策执行的环境因素（Weaver and Rockman, 1993；Hood, 1998；王学杰，2008）。这些环境因素通过影响执行者构建政策执行的叙事策略，潜移默化地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稳定发展时，执行者能够获取更多稳定、准确的执行信息，也能够吸纳政策执行地的社会规范，使其成为政策合法性的依托（王诗宗、杨帆，2018），减少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下的相机执行策略选择

（一）影响执行者相机执行政策的核心因素

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和自由裁量权是影响执行者相机执行政策的核心因素。

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决定了执行者在未完成目标时需要承担的问责后果，具有强化政策执行力的作用（黄冬娅，2020）。自由裁量权决定了执行者能否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执行政策从而让地方获取利益。

1. 政策目标考核压力

在行政集权和财政分权并存的结构下，政策目标考核压力既能实现纵向对上负责，也能达到促进横向区域竞争的效果（姜雅婷、柴国荣，2017）。在同一时期内，执行者通常面临不同的政策执行任务，这些政策任务往往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地位。政策任务的政治地位可以根据其在中央政府优先事项中的地位（Edin and Maria, 2003）、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地位（Tilt, 2007）、政策目标考核指标的“软硬”情况进行衡量。政治地位高的政策任务通常受到上级政府更严格的监督，而政治地位低的政策任务往往体现为上级政府的形式监督（Hall, 2016）。政策目标责任考核制在强化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时具有选择性特征（郁建兴、高翔，201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政策目标考核压力越大，地方政府就越有动力完成执行绩效；政策目标考核压力越小，政策被推行的可能性越小（Pierre and de Fine Licht, 2021）。当然，当政策目标考核压力超出执行者所能承受的范围时，也有可能产生“组织欺诈”行为（Bohte and Meier, 2000），执行者过度关注短期目标并通过变相执行来履行代理人职责（Li, 2015）。综上所述，政策目标考核压力是政策执行者是否扮演忠实代理人角色的核心影响因素。

2. 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是执行者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对某事酌情做出判断和裁决的便宜处置权力（李韬、王佳，2010），具有弱化政策刚性的效果。执行者除履行“契约”任务外，也会利用所掌握的自由裁量权变相执行中央政策进行经济寻租（丁煌等，2004；Kruege, 1974）。在此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责任控制，自由裁量权将演变为一种放任自流、不负责任的权力（韩志明，2008）。有学者认为，自由裁量权越大，政府官员发生腐败的概率越高（Jain, 2001）；自由裁量权越小，就越能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汲铮等，2021）。受执行过程中制度资源稀缺和任务困难等情况影响（Bohte and Meier, 2000），执行者自由裁量权的使用体现了对激励或偏好的反应（Brodtkin, 2011）。执行者有时会将自由裁量权建立在“谁值得帮助”的规范性选择上（Farooqi and Forbes, 2020），或通过牺牲其他重要方面来完成政策目标（Li, 2015），甚至能够使政策决策朝自己喜欢的方向发展（Farooqi and Forbes, 2020）。综上所述，自由裁量权是执行者扮演地方利益代表者角色的核心影响因素。

（二）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下的自由裁量权

由上述可知，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和自由裁量权是影响政策执行者相机执行政策的核心因素。其中，政策目标考核压力由政策任务的政治地位决定，受政策执行情境影响小。而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可从政策潜在解和利益嵌入性^①两个维度进行测量（赵静，2022），与政策执行情境息息相关。受政策质量、执行者、执行对象、执行环境及其相互作用影响，政策执行情境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也会发生变化，继而改变政策潜在解的多少和利益嵌入性的大小，最终影响自由裁量权的大小。

当影响政策执行过程的主要因素处于稳定的、确定的、连续的状态时，政策执行情境的确定性大。在此情境下，一方面，执行者对执行过程中事物本身的特性、状态及其发展变化有较大的把握和预期（臧雷振、陈香妤，2023），能够依靠执行情境的确定性去分析、研究、论证、预测执行情境的不确定性，找出蕴藏在其中关于政策执行对象发展变化的规律，掌握执行问题的本质。因此，执行者实现政策目标所涉及的工具方案比较简单，路径比较单一，相应形成的政策潜在解较少。另一方面，由于执行情境确定性大，政策潜在解少，执行者嵌入利益行为容易被上级政府和公众察觉，因此，利益嵌入性小。当政策潜在解少、利益嵌入性小时，执行者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小（赵静，2022）。由此可知，政策执行情境确定性大时，执行者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小。

反之，当影响政策执行过程的主要因素处于动态的、偶然的和不连续的状态时，政策执行情境的不确定性大。在此情境下，一方面，受人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全（李政、艾尼瓦尔，2018），人的意志的“任意性”（塔勒布，2019），以及道德规范多元（赫勒、李天朗，2018）等因素影响，执行者难以处理不确定性水平上存在的未知数和模糊性（Roggema et al.，2012），导致其依据当前已知信息去思考问题如何恶化的能力不足（Heazle et al.，2013）。因此，执行者为实现政策目标所需的工具方案和资源组合更加复杂多样，执行路径更加多元，相应形成的政策潜在解更多。另一方面，执行情境不确定性大、政策潜在解多的情况，也给执行者提供了更多能嵌入地方利益的执行路径选择，在不确定性大的执行情境掩护下，执行者嵌入利益行为不容易被上级政府和公众察觉，利益嵌入性大。当政策潜在解多、利益嵌入性大时，政策执行者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大（赵静，2022）。由此可知，政策执行情境不确定性大时，执行者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下相机执行策略选择如图1所示。

^① 根据赵静（2022）学者的观点，政策潜在解是指根据实现政策目标所涉及的工具方案、政策路径的情况形成的潜在解决方案。利益嵌入性是指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执行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嵌入自身利益，而决策者不会因未完成代理目标而受到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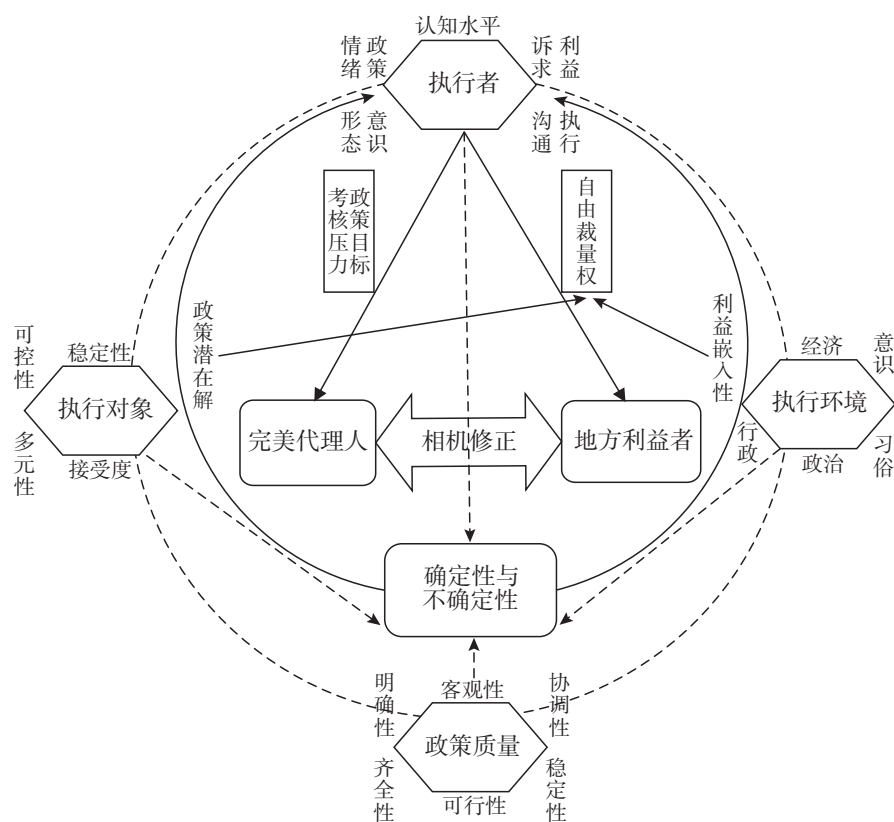


图1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下相机执行策略选择的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下的相机执行策略选择模型

综上，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和自由裁量权是影响政策执行者相机执行政策的核心因素，且自由裁量权受政策执行情境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影响。基于此，本文借助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下的自由裁量权，并综合考虑政策目标考核压力，构建“权力-压力”模型，用以分析执行者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下的相机执行策略选择。在“权力-压力”模型中，执行者采用四种执行策略，分别是波动式执行、象征性执行、政治性执行、行政性执行。这些策略会产生短期有效、效果不佳、效果显著、效果不一这四种执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下相机执行策略选择模型

		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大	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小
政策执行情境	不确定性大，自由裁量权大	波动式执行短期有效	象征性执行效果不佳
	确定性大，自由裁量权小	政治性执行效果显著	行政性执行效果不一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1. 波动式执行

当政策执行情境不确定性大时, 执行者相应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也大。与此同时, 如果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大, 则构成了自由裁量权大、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大的执行结构。在此结构中, 一方面, 执行者能够调整、修正、更替政策路径的自由裁量空间大, 且因处于不确定性大的执行情境中, 执行者能够利用自由裁量权去让地方获益。另一方面, 由于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大, 执行者未完成政策目标面临的问责压力大, 相应会产生强化政策执行力的作用。基于此, 执行者作为理性经济人, 既会考虑利用自由裁量权嵌入地方利益, 也会设法完成政策目标避免被追责问责, 从而相应采取波动式执行策略。

具体而言, 波动式执行策略表现为当距离政策目标考核的时间节点较远时, 执行者主要作为地方利益代表者的角色行动, 利用自由裁量权让地方获益, 政策执行积极性不高, 形成消极执行的局面。当临近政策目标考核的时间节点时, 执行者为避免被追责问责而将作为忠实代理人的角色采取行动, 利用各方面资源采用强有力手段执行政策, 产生运动式执行的现象。波动式执行策略下的消极执行和运动式执行容易产生问题。在消极执行阶段, 政策目标的完成情况远落后于实际要求, 从而积累执行矛盾(陈家建、张琼文, 2015)。在运动式执行阶段, 快速且强力的执行方式不仅容易损害制度本身的合法性, 还会让大量的问题突然爆发(陈家建、张琼文, 2015)。因此, 波动式执行策略虽然短期内完成了政策目标, 但从本质上讲, 这种非制度化的执行策略会削弱制度的规范力, 从而产生问题。

2. 象征性执行

当政策执行情境不确定性大时, 执行者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大。与此同时, 如果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小, 则构成了自由裁量权大、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小的执行结构。在此结构中, 一方面, 执行者根据自身意愿选取、调试、更换政策路径的自由裁量空间大; 另一方面, 执行者无须承担较大的问责压力, 相应地也就无法达到强化政策执行力的效果, 容易出现懒政怠政的执行现象。基于此, 执行者将采取象征性执行策略, 主要发挥地方利益代表者的作用。

具体而言, 象征性执行策略表现为执行者的执行积极性不高, 在不确定性大的执行情境下, 执行者会选择更容易操作、成本更小、用时更少的政策路径, 这些政策路径往往重形式轻内容、重表现轻本质、重布置轻落实, 容易产生“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徐刚、杨雪非, 2017), 执行效果不佳。具体而言, 执行者注重制造执行痕迹来应付政策目标考核, 常用政策宣传、会议召开、文书制作等(孙发锋, 2020)方式来执行政策。象征性执行作为一种非正规的执行策略, 政策执行力度小, 执行随意性大, 容易造成政策空转, 表现为政策执行效果不佳。

3. 政治性执行

当政策执行情境确定性大时，执行者相应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小。与此同时，如果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大，则构成了自由裁量权小、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大的执行结构。在此结构中，一方面，执行者能够调试、更改政策路径或政策目标的自由裁量空间小，嵌入地方利益的意图和行为容易被上级政府和公众察觉。另一方面，执行者因未完成政策目标而承担的追责问责压力大，因此会加强政策执行力。基于此，执行者将采取政治性执行策略，主要发挥忠实代理人的作用。

具体而言，政治性执行策略表现为执行者借助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认同和政治权威产生的高度稳定性、可靠性（贺东航、孔繁斌，2019）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等资源，集中力量完成特定政策任务（周雪光，2012）。权力是政治性执行策略得以实施的关键要素。政治性执行的专断权力具有强制性特征，这也使得执行者能够借助权力传导将其意志赋予执行对象，使政策执行基本上可以按照执行者预设的情况推进，政策执行效果显著。

4. 行政性执行

当政策执行情境确定性大时，执行者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小。与此同时，如果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小，则构成了自由裁量权小、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小的执行结构。在此结构中，一方面，执行者难以借助自由裁量权来让地方获益。另一方面，执行者因未完成政策目标而承担的追责问责压力小，缺乏强化政策执行力的动力，执行积极性不高。基于此，执行者将采取行政性执行策略，担任基本代理人角色，但与忠实代理人相比，执行者的执行积极性和主动性都较弱。

具体而言，在确定性大的执行情境中，执行者实现政策目标所需的政策工具、资源组合、政策路径都比较清晰，执行者依据行政程序，投入一定的资源开展行政性、事务性的政策执行。这种政策执行类似于机器运行（唐啸、陈维维，2017），执行者只是投入一定的资源来维持机器的程序性运行，并不会过多关注机器的运行效益。由于行政性执行策略下的执行者缺少执行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在可控性强的执行场域中执行效果较好，在可控性弱的执行场域中执行效果不佳，最终表现为政策执行效果不一。

四、多案例比较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相较于定量研究而言，定性的案例研究在全面描述政策过程和解释某类现象中的优势更突出（黑尧，2004；安德森，2009）。考虑到多案例研究在提升研

究的外部效度和支持研究结论的普遍性方面更具优势（殷，2010），本文挑选生态保护领域的能耗双控政策、城乡环境卫生清理整治政策、生态保护红线政策、限塑令政策4个案例进行多案例研究。案例选择出于以下考虑：基于理论抽样和复制逻辑的原则（殷，2010），综合考虑典型性（Eisenhardt, 1989；王丛虎、骆飞，2023）、对比性（黄扬、陈天祥，2024）因素，选取4个均为全国统一执行的生态保护政策为案例。生态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政策执行过程需要政府、企业、公众及社会各层面共同努力，执行环境复杂，充满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加之生态保护政策执行容易产生地方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因此，选择生态保护政策作为研究案例，能够较好地观察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下，执行者兼具地方利益代表者和忠实代理人双重角色时相机执行政策的情况。本文通过访谈发展和改革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工信部门、商务部门共25名相关工作人员，并结合参与式观察、搜索二手资料的方式获取4个案例的政策执行情况。

（二）相机执行策略选择的多案例分析

1. 波动式执行策略：能耗双控政策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我国能源转型变革依然任重道远。“十三五”时期，我国实行了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控制（以下简称能耗“双控”）制度。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中央在全国设定能耗强度降低和能源消费总量目标，并将政策目标分解到各地区，通过制定具体的政策目标来监督地方政府完成。“十三五”时期，中央逐年考核地方的能源消费强度和能源消费总量，对未完成能源消费强度目标的地方考核实施“一票否决”制；“十四五”时期，虽然中央优化了考核频次，但对政策执行者而言，依然面临着较大的政策目标考核压力^①。

能耗双控政策的执行情境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主要是由政策执行环境、执行者、执行对象的复杂性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导致的。能源消费强度由能源使用总量与GDP增速的比值决定。能源使用总量深受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能源供需关系、能源价格波动、低碳发展等情况影响，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权变因素。而GDP增速与地区全体社会成员的努力有关，也是政策执行者无法控制的变量。加之能源使用遍布各行各业，政策执行对象多元且具有动态性，需要联合不同部门的负责人员协同配合执行政策，增加了协同执行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此外，能耗双控要求关停“两高”（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也会影响地方

^① 整理自对发展和改革部门的访谈资料（20230907A、20230907B）。访谈资料编码说明：前面为访谈部门，8位数字为访谈日期，最后一位字母为被访谈人员代码。

经济发展，因此，在能耗消费强度受各种各样因素影响且极难掌控的情况下，执行者的工作积极性受到打击。正如发展和改革部门的 C 科长所言：

“我们既无法决定 GDP 增速，也无法全面控制执行对象的能源活动和能源使用总量，因此，我们平时就算做得再多，也很难测算能源消费强度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时候索性就不过度干预能源使用，真到了目标考核时，我们就集中精力做这件事。”（发展和改革部门 20230907C）

由于能耗双控政策的执行情境不确定性大，在此情境下，执行者获得的政策潜在解多，且利益嵌入性大，拥有的自由裁量权相应也大，加之执行者面临的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大，因此构成了自由裁量权大、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大的结构。在此结构中，能耗双控政策的执行者既会考虑地方利益，也会考虑政策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地方利益代表者和忠实代理人双重身份，采取波动式执行策略。当距离政策目标考核期限较远时，执行者优先考虑地方利益，重点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执行政策的积极性差，政策目标完成进度落后。当临近政策目标考核期限时，执行者优先考虑完成政策目标^①，但由于时间短、任务重，往往采取突击完成的方式。在这种消极执行和运动式执行交替的波动式执行策略下，2021 年下半年，全国上下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拉闸限电”行动。“拉闸限电”的发生除受极端炎热天气和能源供应困难的影响外，还可能是地方政府出于实现“能耗双控”年度目标的主动选择^②。2021 年 8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各地能耗强度降低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划分为一至三级预警。对此，多地采取“拉闸限电”措施，在短期内完成了政策目标考核，但这种行为容易对生产生活造成不利影响，导致政策执行对象产生不满情绪。因此，从根本上看，地方政府采取波动式策略执行能耗双控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实现了政策目标，但也导致了一些问题。

2. 象征性执行策略：城乡环境卫生清理整治政策

自 1949 年以来，我国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经历了“除害灭病”运动、“创卫”、社区环境综合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清理整治等多个阶段。当前，中央正推进城乡环境卫生清理整治工作，但未对执行者设置刚性考核要求，系统、严格的考核体系尚未建成，执行者面临的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小。

城乡环境卫生清理整治政策的执行情境不确定性大，这主要是由政策质量、执行环境、执行主体、执行对象及其之间的相互影响所致。现有的整治政策并未设计具体详细的措施指导城乡环境卫生清理工作，政策的模糊性较大。加之

① 整理自对发展和改革部门的访谈资料（20230907C）。

② 参见《多地“拉闸限电”，这是怎么了？》<http://www.ggzc.zju.edu.cn/2021/1011/c54185a2429145/page.htm>，2021 年 9 月 29 日。

整治内容涉及城乡道路、水源、厕所、垃圾、医疗等众多领域，执行环境复杂，同时还需要基于地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开展因地制宜的整治，工作量大，需要投入的建设运营资金多。此外，政策对象庞大且具有流动性，执行者难以控制执行对象，政策执行难度增加。正如发展和改革部门的A处长所言：

“卫生整治不是我们部门的重点工作，但是也不能不干。这细数起来，要整治的地方涉及方方面面，没有一定的人力物力支持是干不好的。尤其是农村，你不能直接整治，还要尊重当地习俗。反正现在中央文件也没有说具体怎样搞，搞成什么样，我们完成常规工作就差不多了。”（发展和改革部门 20240306A）

在政策执行情境不确定性大的情况下，执行者能够获取的政策潜在解多，利益嵌入性大，相应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大，但执行者面临的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小，因此构成了自由裁量权大、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小的结构。在此结构中，执行者主要作为地方利益代表者角色行动，采取象征性执行策略。具体而言，执行者在多重任务与目标的工作状态下，将执行城乡环境卫生清理整治政策排在靠后位置，采取一些简单措施来完成基本政策目标。比如，在推进垃圾分类方面，地方执行者采取政策宣传、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等措施开展工作；在城乡环境清洁方面，地方执行者采取宣传栏设置、“党群大扫除”等行动开展工作。但在污水处理、医疗卫生等整治难度大的领域，政策执行力明显更弱。因此，象征性执行策略容易导致政策空转，政策执行效果不佳。

3. 政治性执行策略：生态保护红线政策

为加强环境保护，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首次提出“生态红线”概念。2014年“生态保护红线”首次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随后，政府相继颁布了系列政策，构建了涵盖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调整、管理、监督等环节的完整制度体系。生态保护红线上升为国家生态保护的战略高度（陈阳等，2023），成为目前我国建立的最为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因此，执行者承担的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大。

从政策质量、执行者、执行对象、执行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来看，生态保护红线政策的执行情境确定性大。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调整、管理、监督、绩效考核等各阶段都制定了相关政策规定，政策具有明确性等特征。中央对生态保护的高度重视，一方面使执行者对生态保护红线政策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部门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能够减少信息冗余与信息熵；另一方面使执行对象对政策刚性的认知水平和接受度都得到提升^①，有利于减少政策执行阻力。此外，伴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全体

^① 整理自对自然资源部门的访谈资料（20240304A、20240304B、20240304D）。

社会成员共建生态文明的意愿更加强烈，媒体曝光、群众举报也成为监督和发现生态破坏问题的重要渠道。而且，生态环境立体遥感监测体系、生态保护红线监督数据库逐渐建设完善，政策执行获得了相关技术支持^①，增加了执行情境的确定性。

生态保护红线政策执行情境确定性大，执行者获取的政策潜在解少，政策利益嵌入性小，相应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也小，但执行者承担的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大，因此构成了自由裁量权小、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大的结构。在此结构中，执行者为避免政策目标考核带来的追责问责，将努力担任好忠实代理人角色，采取政治性执行策略。当前，我国正处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全面完成的阶段^②，采用政治性执行策略以政治权力的强制性特征推动政策执行，能有效减少执行障碍，增强政策的震慑作用，执行效果显著。据2023年8月自然资源部发布的首部《中国生态保护红线蓝皮书》显示，我国划定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04万平方千米，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涵盖我国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90%以上的典型生态系统类型^③。生态保护红线政策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代表性成果和重大制度创新，目前在红线划定阶段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4. 行政性执行策略：限塑令政策

塑料购物袋的大量使用和随意丢弃造成的“白色污染”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问题之一。200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国办发〔2007〕72号，以下简称“限塑令”）明确提出：“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限塑令”是一项需要长期贯彻落实的政策，并未处于地方政府最优先处理的事项中，而且中央对地方没有设置硬性的考核指标，因此，执行者面临的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小。

从影响“限塑令”执行的因素来看，“限塑令”执行情境确定性大。首先，“限塑令”的政策目标具有明确性、连续性、稳定性等特征。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限塑令”是地方政府执行的源政策，对实施日期、实施内容、实施对象、执行主体等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并成为中央政府后续颁布系列政策的依据，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较好。由于中央并未对“限塑令”设置具体的政

① 整理自对自然资源部门的访谈资料（20240304F）。

② 参见《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全面完成》https://www.mnr.gov.cn/dt/ywbb/202305/t20230517_2786668.html，2023年5月17日。

③ 参见《全国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https://www.gov.cn/yaowen/shipin/202308/content_6898470.htm，2023年8月15日。

策目标考核指标，执行部门之间的利益纠纷少，执行沟通较为顺畅，且得益于塑料袋管理技术的普及使用和环保塑料袋生产技术的发展，政策执行条件得到改善^①。此外，绿色生产、绿色消费观念逐渐兴起，执行对象对“限塑令”的认同度和接受度提高，减少了政策执行障碍，使“限塑令”的执行情境更加稳定^②。

在“限塑令”执行情境确定性大的情况下，执行者获取的政策潜在解少，利益嵌入性小，相应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小，加之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小，构成了自由裁量权小、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小的结构。在此结构中，执行者采取行政性执行策略，发挥基本代理人的作用，履行基本职责。具体而言，在执行场域可控性弱的区域，如农贸市场、车站、零售店等，行政性的政策执行力度弱，难以规制执行对象的行为，执行效果不尽如人意；在超市、商场等执行场域可控性强的区域，行政性的政策执行基本能够实现政策目标，政策执行效果明显。总体而言，行政性执行策略下的“限塑令”执行效果喜忧参半，执行效果不一。

上述四个生态保护政策的案例，反映了执行者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下的相机执行策略和执行效果（见表2）。

表2 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下的相机执行策略与执行效果

公共政策	执行情境与自由裁量权情况	政策目标考核压力	执行策略	执行效果
能耗双控	不确定性大，自由裁量权大	大	波动式执行	短期有效
城乡环境卫生清理整治	不确定性大，自由裁量权大	小	象征性执行	效果不佳
生态保护红线	确定性大，自由裁量权小	大	政治性执行	效果显著
限塑令	确定性大，自由裁量权小	小	行政性执行	效果不一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

受政策质量、执行者、执行对象、执行环境等因素影响，政策执行情境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也发生变化，表现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程度之间的差异。当政策执行情境确定性大时，执行者实现政策目标所涉及的政策工具方案比较简单，政策路径较为单一，因此，政策潜在解少。在政策潜在解少的情况下，执行者让地方获利的行为容易被上级政府和公众察觉，因此，利益嵌入性小。当

① 整理自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访谈资料（20230907B、20230907F）。

② 整理自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访谈资料（20230907C）。

政策潜在解少、利益嵌入性小时，执行者相应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也小。因此，执行情境确定性大，执行者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小。反之，政策执行情境不确定性大，执行者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大。

本文根据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下的自由裁量权大小，并综合考虑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大小，构建出“权力-压力”模型，分析执行者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下的相机执行策略选择。在“权力-压力”模型中，执行者采取波动式执行、象征性执行、政治性执行、行政性执行四种执行策略，相应产生短期有效、效果不佳、效果显著、效果不一这四种执行结果。本文通过选取能耗双控、城乡环境卫生清理整治、生态保护红线、“限塑令”四个全国统一执行的生态保护政策进行多案例对比分析。

通过本文研究可知，政策执行者的执行策略选择深受执行情境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影响。从执行者视角来看，选择政策执行策略需要厘清执行情境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而这需要综合考虑政策质量、执行者、执行对象、执行环境这些因素。从上级政府的视角来看，引导政策执行者发挥好忠实代理人的作用，既需要关注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下执行者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大小，也要合理设置政策目标考核压力。当政策执行情境不确定性大时，执行者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大，此时要合理制定对执行者的考核指标，既要避免执行者因考核压力过大而采取波动式执行策略，导致大量的执行问题突然性爆发，也要避免执行者因考核压力过小而采取象征性执行策略，导致政策空转。当政策执行情境确定性大时，执行者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小，此时要警惕执行者因考核压力过小而缺乏政策执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采取行政性执行策略导致执行效果参差不齐。

由于政策执行是一项复杂过程，执行情境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影响，因此，如何有效衡量执行情境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困难。本论文借助史密斯模型框定了影响政策执行情境的四个主要因素，并通过分析四个主要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解决了难以衡量政策执行情境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问题。此外，与传统的政策执行模型主要考虑某一影响因素不同，本文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视角下研究的政策执行模型，综合考虑了政策质量、执行者、执行对象和执行环境及其相互间作用对政策执行情境的影响。与传统的政策执行模型，如 Matland 基于组织理论和决策理论视角构建的“模糊-冲突”模型不同，本文是基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视角下的自由裁量权，并综合考虑政策目标考核压力构建了“权力-压力”模型。该模型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一方面，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科技突飞猛进和世界的深层次矛盾凸显的现实背景下，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执行情境都包含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复杂交织，厘清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复杂情境下的自由裁量权大小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执行都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政策目标考核压力，都需要考虑政

策目标的完成情况。此外，此模型在本文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本文着重分析执行者的相机执行策略选择，因此，从政策类型来看，此模型在本文中适用于地方政府面临双重角色冲突较大的生态政策领域。当然，此模型还适用于分析执行者在经济政策领域的相机执行策略选择。因为经济政策与生态政策类似，其执行情境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都深受政策质量、执行者、执行对象、执行环境的影响，且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政策不同，这些领域的政策执行容易产生地方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因此，研究经济和生态领域政策执行情况能够较好地观察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情境中，执行者兼具双重身份时的相机执行策略选择。然而，此模型在本文中的应用也存在不足。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多案例分析，因此在借鉴史密斯模型分析执行情境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时，较多地停留在静态层面，难以充分讨论多案例的各因素随时间变化对执行情境及执行策略选择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 阿格妮丝·赫勒、李天朗 (2018). 人的境况. 学术交流, (12): 15-23.
- Heller, A. & Li, T. L. (2018). Human Condition. *Academic Exchange*, 12: 15-23. (in Chinese)
- 陈家建、张琼文 (2015). 政策执行波动与基层治理问题. 社会学研究, 30(3): 23-45+242-243.
- Chen, J. J. & Zhang, Q. W. (2015). Policy Implementation Volatility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Issues. *Sociological Studies*, 30(3): 23-45+242-243. (in Chinese)
- 陈水生 (2020). 什么是“好政策”——公共政策质量研究综述. 公共行政评论, 13(3): 172-192+200.
- Chen, S. S. (2020). What Is “Good Policy”? Review of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 Quality.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3(3): 172-192+200. (in Chinese)
- 陈阳、夏皓轩、徐忠、李冠、卓跃飞、王雪琪 (2023). 基于反事实框架的生态保护红线政策成效评估——以宁波市为例. 中国土地科学, 37(11): 128-140.
- Chen, Y., Xia, H. X., Xu, Z., Li, G., Zhuo, Y. F. & Wang, X. Q. (2023).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 Line Based on Counterfactual Framework: A Case of Ningbo City. *China Land Science*, 37(11): 128-140. (in Chinese)
- 丁煌 (2002). 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南京社会科学, (1): 38-44.
- Ding, H. (2002).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Policy Formula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 38-44. (in Chinese)
- 丁煌、定明捷、吴湘玲 (2004).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缘由探析. 科技进步与对策, (7): 146-148.
- Ding, H., Ding, M. J. & Wu, X. L. (2004). Analysis on the Reason of the Game of “There Are Policies Above and Countermeasures Below”.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7): 146-148. (in Chinese)
- 韩志明 (2008). 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与责任控制. 公共管理学报, (1): 41-48+121-122.
- Han, Z. M. (2008). Action Logic and Responsibility Control of Street Bureaucrats.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1): 41-48+121-122. (in Chinese)
- 贺东航、孔繁斌 (2019). 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基于近20年农村林改政策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4): 4-25+204.
- He, D. H. & Kong, F. B. (2019). Political Potential in Pub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ural Forest Reform Policies in the Past 20 Year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 4-25+204. (in Chinese)
- 亨利·N. 波拉克 (2005). 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Pollack, H. N. (2005). *Uncertain Science and Uncertain World*. Shanghai: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in Chinese)
- 黄冬娅 (2020). 压力传递与政策执行波动——以A省X产业政策执行为例. 政治学研究, (6): 104-116+128.
- Huang, D. Y. (2020). Pressure Transmission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Fluctuation: A Case Study of Industri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A Province.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 104-116+128. (in Chinese)
- 黄扬、陈天祥 (2024). 代理型政策企业家与数字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基于“政务中台”建设的多案例比较. 公共管理学报, 21(3): 63-78.

- Huang, Y. & Chen, T. X. (2024). Policy Entrepreneurs as Agent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Innovation in Digital Govern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ultiple Case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iddle Platform.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1(3): 63-78. (in Chinese)
- 汲铮、华生、蔡倩、李秀萍 (2021). 腐败治理、自由裁量权与管制权力边界. 世界经济, 44(12): 155-177.
- Ji, Z., Hua, S., Cai, Q. & Li, X. P. (2021). Corruption Governance, Discretion and the Boundary of Regulatory Power.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44(12): 155-177. (in Chinese)
- 姜雅婷、柴国荣 (2017). 目标考核、官员晋升激励与安全生产治理效果——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公共管理学报, 14(3): 44-59+156.
- Jiang, Y. T. & Chai, G. R. (2017). Target Assessment, Official Promotion Incentive and Work Safety Governance Effect: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14(3): 44-59+156. (in Chinese)
- 李栋 (2017). 教育逻辑之规与教育生命之魅——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联姻”. 教育科学, 33(4): 1-10.
- Li, D. (2017). The Rule of Educational Logic and the Charm of Educational Life: The Marriage of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Education Science*, 33(4): 1-10. (in Chinese)
- 李瑞昌 (2012). 中国公共政策实施中的“政策空传”现象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 5(3): 59-85+180.
- Li, R. C. (2012). Research on the Phenomenon of “Policy Air Transmiss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5(3): 59-85+180. (in Chinese)
- 李韬、王佳 (2010). 自主性、裁量权与公共管理者的责任. 中国行政管理, (10): 57-60.
- Li, T. & Wang, J. (2010). Autonomy, Discret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Public Administrators.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10): 57-60. (in Chinese)
- 李政、艾尼瓦尔 (2018). 不确定性是实行产业政策的主因——企业家追求创业机会的视角. 社会科学研究, (3): 21-27.
- Li, Z. & Ainiwaer (2018). Uncertainty Is the Main Cause of Industrial Policy: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 Pursuing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 21-27. (in Chinese)
- 刘伟忠 (2006). 政策失败的执行主体因素考量. 社会科学家, (5): 80-84.
- Liu, W. Z. (2006). The Main Factor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Failure. *Social Scientist*, (5): 80-84. (in Chinese)
- 刘祖云 (2007). 政府间关系：合作博弈与府际治理. 学海, (1): 79-87.
- Liu, Z. Y. (2007).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Cooperation Game and Intergovernmental Governance. *Academia Bimestris*, (1): 79-87. (in Chinese)
- 罗伯特·K. 殷 (2010).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第4版). 周海涛等, 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Yin, R. K. (2010).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Zhou, H. T. et al, Trans.).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马克斯·韦伯 (1997). 官僚制. 彭和平等, 译.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Waber, M. (1997). *Bureaucracy*. (Peng, H. P. et al, Trans.). Beijing: CPC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迈克尔·黑尧 (2004). 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 赵成根, 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 Hill, M. (2004). *The Policy Process in the Modern State*. (Zhao, C. G., Trans.). Beijing: China Youth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2019). 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 万丹, 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 Taleb, N. N. (2019). *The Black Swan*. (Wan, D., Trans.). Beijing: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in Chinese)
- 倪星、谢水明 (2016). 上级威权抑或下级自主：纵向政府间关系的分析视角及方向. 学术研究, (5): 57-63.
- Ni, X. & Xie, S. M. (2016). Superior Authority or Subordinate Autonomy: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and Direction of Vertical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cademic Research*, (5): 57-63. (in Chinese)
- 宁国良、邓瑞芬 (2009). 执行主体选择性执行公共政策的心理因素分析. 湖北社会科学, (7): 28-30.
- Ning, G. L. & Deng, R. F. (2009). 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the Executive Subject's Sel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olicy. *Hubei Social Sciences*, (7): 28-30. (in Chinese)
- 孙发锋 (2020). 象征性政策执行：表现、根源及治理策略. 中州学刊, (12): 15-20.
- Sun, F. F. (2020). Symbo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Manifestations, Root Causes,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12): 15-20. (in Chinese)
- 汤火箭、刘为民 (2012). 地方政府对财政政策的执行策略：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行政管理, (10): 78-82.
- Tang, H. J. & Liu, W. M. (2012). Fisc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Local Government: An Analysis Framework.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10): 78-82. (in Chinese)
- 唐啸、陈维维 (2017). 动机、激励与信息——中国环境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与类型学分析.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1): 76-81+127-128.
- Tang, X. & Chen, W. W. (2017). Motivation, Incentive and Informati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Typological Analysi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 (1): 76-81+127-128. (in Chinese)
- 王丛虎、骆飞 (2023). 超大城市推进综合行政执法的改革逻辑与未来进路——基于北京市行政执法改革的纵向多案例. *中国行政管理*, 39(11): 63-72.
- Wang, C. H. & Luo, F. (2023).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in Mega-Cities Reform Logic and Future Approach: Multiple Longitudinal Cases Based on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Reform in Beijing.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39(11): 63-72. (in Chinese)
- 王诗宗、杨帆 (2018). 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调适性社会动员: 行政控制与多元参与. *中国社会科学*, (11): 135-155+205-206.
- Wang, S. Z. & Yang, F. (2018). Adaptive Social Mobilization in Grass-Roo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Administrative Control and Multiple Participat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1): 135-155+205-206. (in Chinese)
- 王学杰 (2008).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力的结构分析. *中国行政管理*, (7): 62-65.
- Wang, X. J. (2008). Structural Analysis of Chinese Public Policy Execution.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7): 62-65. (in Chinese)
- 王永昌、李梦云 (2021). 世界大变局视野下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10): 108-119.
- Wang, Y. C. & Li, M. Y. (2021).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Frontiers*, (10): 108-119. (in Chinese)
- 王法硕、王如一 (2021). 中国地方政府如何执行模糊性政策? ——基于 A 市“厕所革命”政策执行过程的个案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 18(4): 10-21+166.
- Wang, F. S. & Wang, R. Y. (2021). How Do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Enforce Ambiguous Policies?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Toilet Revolution” Policy in A City.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18(4): 10-21+166. (in Chinese)
- 徐刚、杨雪非 (2017). 区(县)政府权责清单制度象征性执行的悖向逻辑分析: 以 A 市 Y 区为例. *公共行政评论*, 10(4): 54-79+193-194.
- Xu, G. & Yang, X. F. (2017). The Behavioral Logic of the Symbolic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List System on District and County Government: A Case Study of Y District of A City.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0(4): 54-79+193-194. (in Chinese)
- 徐建牛、施高键 (2021). 相机执行: 一个基于情境理性的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分析框架. *公共行政评论*, 14(6): 104-123+199.
- Xu, J. N. & Shi, G. J. (2021). Camera Executi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Grassroots Government Policy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Situational Rationality.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4(6): 104-123+199. (in Chinese)
-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2006). 知识的不确定性. 王昺等, 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 Wallerstein, I. (2006). *The Uncertainties of Knowledge*. (Wang, B. et al, Trans.).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 郁建兴、高翔 (2012). 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 (5): 95-112+206-207.
- Yu, J. X. & Gao, X. (2012). The Behavior Logic and System Foundation of Local Development-Type Government.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5): 95-112+206-207. (in Chinese)
- 臧雷振、陈香妤 (202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转换的内在逻辑: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徘徊. *浙江学刊*, (1): 61-70.
- Zang, L. Z. & Chen, X. Y. (2023).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s: The Hesitation Between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1): 61-70. (in Chinese)
- 詹姆斯·E. 安德森 (2009). 公共政策制定. 谢明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Anderson, J. E. (2009). *Public Policy Making*. (Xie, M. et al, 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张翔 (2019). 基层政策执行的“共识式变通”: 一个组织学解释——基于市场监管系统上下级互动过程的观察. *公共管理学报*, 16(4): 1-11+168.
- Zhang, X. (2019). “Consensus Adapt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 Organizational Explanation Based on Observations of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Superiors and Subordinates in the Market Supervision System.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16(4): 1-11+168. (in Chinese)
- 赵静、薛澜 (2013). 地方政府的角色原型、利益选择和行为差异——一项基于政策过程研究的地方政府理论. *管理世界*, (2): 90-106.
- Zhao, J., Chen, L. & Xue, L. (2013). Role Archetypes, Interest Selection and Behavioral Differences of Local Government: A Theory of Local Government Based on Policy Process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 90-106. (in Chinese)
- 赵静、薛澜 (2021). 探究政策机制的类型匹配与运用. *中国社会科学*, (10): 39-60+205.
- Zhao, J. & Xue, L. (2021). Explore the Type Matching and Application of Policy Mechan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 39-60+205. (in Chinese)
- 赵静 (2022). 执行协商的政策效果: 基于政策裁量与反馈模型的解释. *管理世界*, 38(4): 95-108+141+109.
- Zhao, J. (2022). Policy Effects of Executive Negotiation: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Policy Discretion and Feedback

- Models.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38(4): 95-108+141+109. (in Chinese)
- 支广东、李强彬 (2024). 政策空间、组织资源与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差异化策略——基于 S 省 A 镇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 40(3): 39-50.
- Zhi, G. D. & Li, Q. B. (2024). Policy Space,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and Differentiated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Four Cases of A Town in S Province.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40(3): 39-50. (in Chinese)
- 周芬芬 (2006). 地方政府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的执行策略——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分析. *教育与经济*, (3): 61-64.
- Zhou, F. F. (2006).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Adjustment of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Layout: An Analysis Based on Fuzzy-Conflict Model. *Education & Economy*, (3): 61-64. (in Chinese)
- 周雪光 (2012). 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 *开放时代*, (9): 105-125.
- Zhou, X. G. (2012). Sports Governance Mechanism: Rethinking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Open Times*, (9): 105-125. (in Chinese)
- 庄国波 (2005). 公共政策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理论探讨*, (6): 117-120.
- Zhuang, G. B. (2005).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Difficult Pub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6): 117-120. (in Chinese)
- Bohte J. & Meier, K. J. (2000). Goal Displacement: Assessing the Motivation for Organizational Chea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0(2): 173-182.
- Brodikin, E. Z. (2011). Policy Work: Street-Level Organizations Under New Managerialism.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1(Suppl_2): i253-i277.
- Chuaire, M. F. & Scartascini, C. (2014). The Politics of Policies: Revisiting the Quality of Public Policies and Government Capabilit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olicy Brief*, IdB-Pb-220.
- Eisenhardt, K. M. (1989).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4), 532-550.
- Edin, M. (2003). State Capacity and Local Agent Control in China: CCP Cadre Management from a Township Perspective. *The China Quarterly*, 173: 35-52.
- Farooqi, S. & Forbes, T. (2020). Enacted Discre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Local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Services in Pakistan.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2(8): 1217-1239.
- Hall, P. (2016). *The Swedish Administrative Mode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wedish Politics, 299-314.
- Heazle, M., Tangney, P. & Burton, P. et al. (2013). Mainstream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 Incremental Approach to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in Australia.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33: 162-170.
- Hood, C. (1998). Individualized Contracts for Top Public Servants: Copying Business, Path-Dependent Political Re-Engineering—or Trobriand Cricket?. *Governance*, 11(4): 443-462.
- Jain, A. K. (2001). Corruption: A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5(1): 71-121.
- Knoepfel, P., Corinne, L., Frédéric, V. & Hill, M. (2007). *Public Policy Analysis*,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 Krueger, A. O. (197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3): 291-303.
- Li, J. (2015). The Paradox of Performance Regimes: Strategic Responses to Target Regimes in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93(4): 1152-1167.
- Matland, R. E. (1995). Synthes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Literature: The Ambiguity-Conflict Model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5(2): 145-174.
- O'Brien, K. J. & Li, L. J. (1999). 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31(2): 167-186.
- Pierre, J. & De Fine Licht, J. (2021). Collaborative Gaming: When Principals and Agents Agree to Game the System. *Public Administration*, 99(4): 711-722.
- Roggema, R., Vermeend, T. & Van den Dobbelsteen, A. (2012). Incremental Change, Transition or Transformation? Optimising Change Pathways for Climate Adaptation in Spatial Planning. *Sustainability*, 4(10): 2525-2549.
- Smish, T. B. (1973).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Policy Science*, 4(2): 203-205.
- Tilt, B. (2007).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Pollution Enforcement in China: A Case from Sichuan's Rural Industrial Sector. *The China Quarterly*, 192: 915-932.
- Weaver, R. K. & Rockman, B. A. (1993). *Do Institutions Matter? Government Capab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责任编辑：陈 娜

英文目录与摘要

JP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18 No. 3, 2025

●SYNOPSIS: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udy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under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A Study on Discretionary Decision-Making in Public Policy Shenghui Li, Dan Li & Shaotang Zhu

Abstract Examining the discretionary strategy selection of implementers—who serve dual roles as both loyal agents and local interest representatives under conditions of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helps unpack the “black box”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analyze their behavioral logic. By leveraging the discretion shaped by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along with considering the pressure of policy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power-pressure” model. Within this model, implementers adopt four strategies: fluctuating implementation, symbolic implementation, political implement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implementation, leading to four corresponding outcomes: short-term effectiveness, poor effectiveness, significant effectiveness, and mixed effectiveness. Through a comparative multi-case analysis of four major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olicies in China, the study reveals the mechanism behind implementers’ discretionary strategy selection in contexts of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Key Words Certainty; Uncertainty; Differential Coping;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The Logic of Local Soci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Case of “Multi-School Zoning” Reform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 Yu Zeng & Guangming Jia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reforms such as the “Multi-School Zoning” policy to promote educational equity. This study examines local variation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mainly from fou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cluding administrative pressure, public demand, career incentives for officials, and 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ies. It reveals that loc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simultaneously pursues two primary objectives: equity and development. By coding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policies of 283 prefecture-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conducting event history analys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when the growth of land revenue slows down, local governments tend to promote equaliza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resources. This conclusion reflect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equity policie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empirical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equal access to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advanc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Education Equity; 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 Multi-School Zon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RTICLES

How Can the Special Strike Campaign of Grassroots Digital Formalism Be Effective?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ampaign Initiators Jingyu Zhang, Tian Gan & Yong Guo

Abstract Formalism is a persistent challenge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the issue of digital

formalism brought about b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Local governments have attempted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through special strike campaigns. However, under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 can these campaigns achieve long-term effectiveness? Existing studies generally view special strike campaigns as a specific manifestation of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Due to issues such as collusion, high mobilization costs, and disruption of the normal functioning of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measures remains questionable. Nevertheless, City A in Zhejiang Province established a dedicated task force led by the Party Office, the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the Big Data Bureau to tackle “formalism at the fingertips,” achieving notable results and maintaining them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This provides us with an insightful case study. Unlike previous research,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itiators of special strike campaigns and finds that having the initiating departments and the rectified departments belong to different systems is key to solving the issue of collusion. Furthermore, if the initiating departments possess a rational power structure, this kind of special strike campaigns can effectively carry out thorough investigations to obtain genuine information, engage in flexible consultations to formulate scientific plans, employ reverse mobilization to overcome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ies, reduce collusion and enhance supervision quality, and ultimately establish long-term mechanisms. This approach performs well across five procedural elements—information, planning, execution, supervision, and conclusion—achieving desirable rectification outcomes. This finding not only expands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insights for effectively addressing grassroots formalism and improv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performance.

Key Words Grassroots Formalis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pecial Strike Campaign;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and Rationale of Agil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A Research Perspective Based on Deconstructing Institutional Action Situations

..... Tingjia Chen, Ziyi Zhao & Tao Sun

Abstract Agile governance provides new mindsets and alternatives for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digital age. Aiming at conceptual development, existing research focuses on normative discussions of agile governance with illustrative cases, and develops a set of agile principles. However, urban governance system is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Current research struggled to provide generalizabl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and rigorous empirical analyses for the complexity. This study brings local public economy theory to agile governance research, and examines the rationale of urban agile transformation by employing action situation as the unit of analysis. The authors conducted a three-year continuous fieldwork on the “Holistic Smart Urban Governance” practice of J District in W municipality.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ly, agility varies in both quality and frequency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of action situations. The contents of agile transformation at various action situations are different. As the level of action situation deepens, agility diminishes, and stability becomes prominent. Secondly, the interaction among action situations determines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the agile practice. The incompatible local institutions constrain the agil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public service production and provision. Thirdly, non-governmental entities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ool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agile transformation at the lower-level action situation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intentional comprehensive design and agile mindsets. However, as the level of action situation deepens, rational

choices and proactive actions by the government become crucial. This study advances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agile governance in academia, and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spurring agile transformation in practice.

Key Words Agile Governance; Urban Governance; Action Situation; Public Service

How Do Historical Legacy Issues Arise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 Cas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ism” Phenomenon i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Chenglong Yu & Xiaohua Zheng

Abstract Historical legacy issues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are not unresolved due to prolonged waiting, but rather because the “policy window” has not been further opened to the “decision-making window.” The “presentism” strategy i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is the deep-seated cause of such problems. The case of Coastal Village Q demonstrates that early officials achieved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through “active presentism,” stacking current resources and compressing current costs, yet left problem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Successive officials regarded these legacy issues as social risks and addressed them promptly through “passive presentism,” such as delaying, escalating, transferring, or patching up the problems, which also led to their continuous postponement. Consequently, the continuous decision-making continuum of “presentism” by local governments at different times has made problems that should have been resolved initially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solve as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evolve. In fact, under the time pressure brought by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social risks, local governments’ choice of “presentism” as a coping strategy is largely situational rationality. The paradox lies in that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granting it rationality will inversely weaken its rationality in the future, thereby leading to the continuous reproduction of historical legacy issues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Key Words Historical Legacy Issues; Grassroots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Presentism”; Time

Activating “Public” and “Common”: County-Level Social Organizations Bridging Structural Holes Xuefei Lin & Yajie Shan

Abstract The rural livelihood supply network typically involves both the government-led public sector and the locally rooted common sector. Both sectors operate as closed systems, independently and in parallel, relying on differentiated organizations and resources. The Y Foundation in Xiong Town occupies the structural hole between the two sectors, serving as a bridging mechanism. It integrates existing resources from both public and common sectors through strategic alliances, joint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nd other collaborative methodologies. The Y Foundation in Xiong Town leverages the charity organization model to conduct volunteer activities and deliver specialized services, thereby driving innovative production in livelihood supply. Through government-society cooperation, it effectively enhances the quality and expands the coverage of local livelihood provision systems. The bridging rol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rural areas is driven not only by the rational considerations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enhance their foundational power but also by the societal demand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philanthropy, rather than being a result of a strong side taking over the other side. This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stems from the clan social network, the philanthropic culture, and stable government-business connections in rural areas. Together, these three elements form

a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power and facilitate government-society elites to engage in collective action based on local moral values and norms. Therefore, research o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chored in county-level societies can uncover indigenous characteristics of government-society interactions and innovative institutional pathways therein.

Key Words Livelihood Supply Network; Bridging Intermediary; Government-society Interaction; County-level Space; Rural Society

Information Intervention and the Willingness of Flexible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Pensio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Experiment Menghan Shen, Chuping Su & Guangjun Shen

Abstract Flexible workers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labor force. Current policies related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se workers in social pension primarily encourage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However, in practice, a large portion of flexible workers are not enrolled in social pension. This paper employs randomized experimental method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intervention on the willingness of workers in food delivery couriers to take up social pens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provid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benefits of pension insurance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couri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s well as their willingness to extend the duration of their participation and increase their contributions. The increase in willingness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groups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higher incomes, older psychological ages, those planning to work as couriers long-term, and those with higher financial literacy. Additionally, information intervention reduces the preference for having male children among these workers, potentially helping to address the imbalance in the gender ratio in China.

Key Words Information Intervention; Social Pension; Take-up; Flexible Workers; Randomized Control Experiment

The Inequality in Municipal Governments' Cooperation: A Study Based on the Network of Offsite Visits by Municipal Official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 Gangjian Lin, Yuanshuo Xu & Weiwen Zhang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relies on a balanced and reciprocal network of municipal cooperation.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mostly simplify municipal cooperation to undirected and equal connections, overlooking the differences in cooperation willingness and resource investment, namely the cooperation inequality. This study uses large language models to identify 16,039 cooperative offsite visit events from over 720,000 government website news data, constructing a panoramic network of official offsite visits among 41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10–2023. 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equality in informal cooperation among municipal government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overall cooperation inequal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hows a declining trend, with heterogeneity across different cooperation fields and levels. At the city level, both efficiency logic and administrative logic jointly determine the cooperation strategies between municipal governments, affecting cooperation inequality between different cities and forming complex cooperation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The study innovatively uses large language model technology for empirical research on local government networks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equality for the first time, providing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tate

and future path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Key Words Offsite Visits; Large Language Model; Local Government Network; Yangtze River Delta; Cooperation Inequality

Alliance Conflict and Policy Learning in Glob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Xiaokang Lei & Linxia Yu

Abstract Glob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has gone beyond the scope of simple technical regulation and evolved into a deep game involving the ethical found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As a strategic technology with significant non neutrality characteristics, AI is becoming a new carrier of value system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and the struggle for governance dominance has become a strategic priority for major economies. However, the uncertainty of technological iteration combined with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has led to a dual alien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ecosystem, characterized by fragmented rules and value camps. There ar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trong regulatory alliance” and the “weak regulatory alliance” in terms of technical ethics, rule making power, and cross-border jurisdiction. The existing governance mechanism is difficult to resolve the coordination dilemma caused by thes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However, the ethical paradigm of “intelligence for good”, multi-level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professional dialogue platforms constructed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to break through the governance deadlock. Based on the initiative alliance framework, it is suggested to establish a three-level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the core layer strengthens institutional compliance, the auxiliary layer optimizes dynamic coordination, and the influence layer improves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This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can ensure the human centered orientation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enhance the regional adaptability of governance plans, and ultimately achieve a positive cycle of technological ethics and human value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Strong Regulatory Alliance; Weak Regulatory Alliance; Policy Learning

●THEORETICAL REVIEWS

Meta-Analysi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rogress, Paradigms, and Directions

..... Qing Miao & Xingkui Zhu

Abstract As a powerful methodological tool for reconciling inconsistent research findings, meta-analysis is exerting a growing influence on the paradigmatic develop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broader social sciences. First, this study provides a concise overview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distinct advantages of meta-analytic methods. Second, it systematically reviews 54 meta-analyses published in lead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journal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mapping their publication trends and thematic focuses. Third, it summarizes ten essential operational steps for conducting rigorous meta-analyses. Finally, it introduces three advanced meta-analytic approaches, including three-level meta-analysis, and outlines their potential to foster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Key Words Meta-Analysis; Research Paradigm; Public Administration;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公共行政评论

双月刊, 2008年创刊
第18卷, 第3期(总第105期)
2025年6月15日出版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imonthly, Since 2008
Vol.18 No.3
Published in June 2025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
协办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广东省行政管理学会

社 长 肖 滨
主 编 朱亚鹏

联系电话 020-84113029 020-84038746

电子邮件 jpachina@163.com

编辑出版 《公共行政评论》编辑部
(广州新港西路135号; 邮编510275)

印 刷 广州一龙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传 真 020-84111478

网 址 <http://jpa.sysu.edu.cn>

Administrator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ponsors Sun Yat-sen University

Supporters Centre for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ciety

President: Bin Xiao

Editor in Chief: Yapeng Zhu

Tel: 86 20 84113029 86 20 84038746 Fax: 86 20 84111478

Email: jpachina@163.com Website: <http://jpa.sysu.edu.cn>

Edited by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135 Xin Gang Xi Road, Guangzhou, China. 510275)

Distributed by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O.Box 399, Beijing, China)



刊号 ISSN1674-2486
CN44-1648/D

邮发 国内46-364
代号 国外BM8839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定价: 20.00元

ISSN 1674-2486



9 771674 248258